

传承红色基因

——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主 编 冷晓海 崔江宁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红色基因：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 冷晓海, 崔江宁主编. —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50-2024-2

I. ①传… II. ①冷… ②崔… III. ①井冈山精神—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6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2329 号

书 名 传承红色基因——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作 者 冷晓海 崔江宁
责任编辑 杨逢仪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编 辑 部 (010) 68928761 68929009
网 址 <http://cbs.nsa.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30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2024-2
定 价 30.0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井冈星火，革命摇篮	1
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
一、向井冈山进军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	1
二、朱毛会师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5
三、红四军下山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期斗争	13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起点	18
一、工农武装点燃星星之火	18
二、土地革命轰轰烈烈	20
三、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	23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摇篮	25
一、复兴中国革命的榜样	25
二、聚集革命力量的阵地	29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	32
第二章 井冈精神，红色基因	40
第一节 井冈山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	40
一、马克思主义是井冈山精神的理论基础	40
二、中华民族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文化渊源	48
三、党的早期革命斗争是井冈山精神的现实基础	57



第二节	井冈山精神是党和国家永恒的财富	66
一、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特征	66
二、	井冈山精神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	71
三、	井冈山精神是跨越时空的革命精神	72
第三章	坚定执着，追逐理想	75
第一节	“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	75
一、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75
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6
三、	坚信党和苏维埃政府	78
第二节	坚定执着举红旗	79
一、	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79
二、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80
三、	这是中国的 1905 年	82
第三节	追逐理想肯牺牲	83
一、	不畏难更不怕死	83
二、	活着就跟共产党	84
三、	血肉铸就理想信念	85
第四章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87
第一节	“实事求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	87
一、	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87
二、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89
三、	创立新型人民军队	90
第二节	实事求是干革命	91
一、	在挫折和失误中成长	92
二、	立足当下建立革命根据地	100
三、	思想建党纯队伍	103
第三节	继往开来闯新路	107
一、	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路	107
二、	开创新的革命大本营	109
三、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113



第五章 艰苦奋斗，攻克难关	115
第一节 “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	115
一、艰苦的生活条件	115
二、克服艰苦条件	116
三、自力更生突破经济封锁	118
第二节 艰苦奋斗不畏难	120
一、上下一心，吃苦耐劳	120
二、让有限的物资发挥更大的作用	122
三、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123
第三节 众志成城攻难关	126
一、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27
二、以身作则，同甘共苦	127
三、军民齐心，共渡难关	129
第六章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132
第一节 “依靠群众”是井冈山精神的根本	132
一、了解群众所想所需	132
二、相信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133
三、依靠群众是力量之源	133
第二节 党政军民一体同心	135
一、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135
二、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	138
三、党政军民鱼水情深	141
第三节 依靠群体奏凯歌	146
一、革命热情齐高涨	146
二、唤起工农千百万	147
三、众志成城反“围剿”	152
第七章 红色精神，永放光芒	158
第一节 党中央领导核心倡导井冈山精神	158
一、毛泽东：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158
二、邓小平：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160



三、江泽民：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	162
四、胡锦涛：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	163
五、习近平：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65
第二节 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168
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	168
二、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175
三、传承艰苦奋斗本色	176
四、激发创新创业勇气	181
五、担当历史新使命	183
参考文献	191



第四章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第一节 “实事求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

秋收起义失利以后，毛泽东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将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实事求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

一、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同志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果断决定退兵湖南省浏阳的文家市。他在里仁学堂召开前委会议，会上经过激烈讨论，结果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前委委员的赞同，决定放弃“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向萍乡退却”，然后退往湘南。

此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明确的落脚点。文家市会议后，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在攻下莲花县时，起义前由浏阳县委派往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请示，未能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宋伍劳返回后，在莲花联系上了工农革命军，把汪泽楷的一封信呈给毛泽东同志，信上说“宁冈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条枪”。毛泽东同志综合考虑了莲花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等对井冈山的介绍，遂决定再放弃退往湘南，改向井冈山进发。

秋收起义部队撤到井冈山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或者说面临三大具体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进剿”“会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吃饭太难”是最大的问题。刚开始千余人的粮食还好办，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万余人的队伍，人要吃马要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550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周期的，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同志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但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领导边界各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这样，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就立住了脚。同时，宁同等县的基层党组织也逐步恢复，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田后的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



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因此支前拥军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随后逐步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及时作了理论总结，于1928年10月、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制定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是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仅是战术层面的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尚需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然而，这种探索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没有现成的经验；二是有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三是不时受到中央错误方针的干扰。

毛泽东同志率部刚上井冈山不久，1927年11月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无端指责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开除了毛泽东同志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了井冈山，贯彻执行临时中央政治局上述会议的决议，指责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开除毛泽东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议错传为“开除党籍”。后来这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错传很快得到纠正。

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一省的局部地区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给朱德、毛泽东同志并前委的信中说，“从广州暴动中，我们更得到许多重要的教训：……认识了全省在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这个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了，但这个正确的认识在六大召开后就改变了，中央仍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1929年年初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后，由于一时没有根据地为依托，斗争环境更加险恶，部队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2月7日，中央来信，提出“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说这“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中央的“二月来信”使军中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找到了根据。结果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撤掉。红四军党的七大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受前委委托到中央汇报工作，当周恩来同志等了解了红四军真实情况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中央于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明确“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召开。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从组织上建设，主张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二是如何建军，毛泽东同志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规定了正确处理军内外



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使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有了可靠的保证。毛泽东同志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当毛泽东同志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不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性问题即道路问题时，一种悲观情绪在全军蔓延。其表现是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一星期后，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编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同志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那么如何在广大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于根据地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作了错误的指导。会议决议案批评了我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要求井冈山的朱毛红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开始革命的进攻”。

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对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于6月16日以边界特委名义写给湘、赣两省委的信中，提出三条理由说明红四军不应该开往湘南，而应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1月25日，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在科学分析当时中国国情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后提出的真知灼见，他的认识显然要高出从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者许多倍。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结果造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同志后来将“八月失败”的教训总结为：“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制的推



广”。

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存在一种热衷于以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的主张，轻视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根据地建设与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有机紧密地结合起来，并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首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果实就保不住，土地革命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同样，没有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存在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靠武装斗争来开辟、巩固和发展的，因此，要进行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就离不开武装斗争。其次，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红军就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都离不开土地革命。最后，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就不可能开展起来。

同样，没有根据地的建立，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依托，就有变成流寇主义而被敌人击败的危险。

三、创立新型人民军队

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边战边退，退至永新三湾村时，基本上摆脱了追敌。但部队人员锐减，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悲观消沉和急躁盲动的思想情绪并存。这一切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罗荣桓曾回忆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张宗逊曾回忆说：“秋收起义后，部队遭到几次挫折，战斗减员很大，加上长途行军转移，病号很多，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涣散。”赖毅也回忆说：“部队中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部队。”“毛泽东同志是在这个最紧要关头，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觉察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于是就开始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且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

为了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分析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提出了改编的主张并得到通过。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最核心的内容是建立了两大制度：一是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将以前一个团一个支部改成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前委统一领导，从而确立了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权；二是在部队中建立了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提出了“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口号，废除体



罚制度和克服打人骂人的现象，并在全军中进行民主教育。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为我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最早的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探索与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开始形成。

后来，无论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还是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都是按照三湾改编确立的基本制度来进行组建。历史表明，三湾改编“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对建设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项任务”的提出和颁布，明确了军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乃至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和平年代，虽然人民军队群众纪律的具体内容与时俱进，但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形成的原则、核心、灵魂始终没有变，从而确保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始终不变。

坚持党的领导是军队的灵魂。为了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部队中加强了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军中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从而使党对军队的领导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在红军中各级设立党代表，是红军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党代表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实行“三项任务”、执行革命纪律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我党宣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在根据地逐步形成军民鱼水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军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一项创造，是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关于士兵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当时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杨开明）在其报告中说：“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主，长官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会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由此可见，士兵委员会在军中有着一一定的权力，起了很大的作用。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然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第二节 实事求是干革命

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干革命，有许许多多问题需要考虑，但是分析形势建基地，思想建党纯队伍，自力更生促发展，则是他重点思考的问题。



一、在挫折和失误中成长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也面临着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重大抉择。当时，共产国际内部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革命道路模式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内处于领导地位的多数同志，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真理，还未能摆脱西欧或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心城市的起义上。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党内先后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为消除错误指导和错误路线的影响，挽救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开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一）在革命低潮中奋起

1927年——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陷入低潮，肩负民族希望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次艰难的、历史性的选择。为了争取生存权，更为了民族的解放和进步，中国共产党被迫把工作中心转移至农村，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企图用血腥的政策消灭革命。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约有45万人被杀。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明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才可能有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7日，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和方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与国民党关系的问题上，他批评了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做客人，党的领导始终无做主人的决心的错误；在农民问题上，他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在军事问题上，他批评了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新的政治局常委应更加注意这个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并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客观形势，因而没有根据各地区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来组织正确的反攻和积极的退却，以保存革命阵地，聚集革命力量。

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相继举行了工农武装起义，共有200多次。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经历了失败与挫折，但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同时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

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这里的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到达长沙后，立即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同省委一



起详细讨论研究了起义的具体计划，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书记。9月初，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发动秋收起义、分路会攻长沙的计划。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4个团，共5 000多人，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张家湾会议后，各路起义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赴铜鼓直接指挥那里的起义。

9月9日，震撼湘赣、影响中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完全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中共湖南省委发动长沙工人赤卫队和近郊农民首先行动起来，破坏岳阳至株洲的铁路交通。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四个团，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并先后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等地。但是，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而且起义部队的某些指挥员缺乏经验和警惕，措施失当，加之第四团中的旧军队临阵叛变，以致起义先后受挫。尽管如此，这次起义行动还是有力地推进了湖南的革命形势。当时的《晨报》这样指出：“共产党在湘省之潜势力，实已深入农工群众中，无怪其四处蔓延矣。各镇乡农民，……各地蜂起，不止一隅，殊使省军疲于奔命。”

9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集合了受挫后的起义部队。文家市——湘赣边界的一个山区小镇，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大革命时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同志一到这里，立刻找各路部队的干部、战士，了解战斗情况和思想动态。然后，起义部队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攻占长沙这一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决定放弃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军整装待发的那一天，毛泽东同志进行思想动员。他讲道，秋收起义原计划打长沙，大家都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长沙好，可是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坚持干，就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使不少指战员的思想豁然开朗，从挫折中振奋起来。文家市决策，不仅是秋收起义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战略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战略思想开始产生：不和敌人在城市硬拼，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寻找新落脚点，积蓄力量，壮大队伍，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于10月初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秋收起义指挥上有失误，没有高度集中部队，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而敌人却集中力量打了我们。他分析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指出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他还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古城会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明确了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并且初步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如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派人做井冈山绿林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的工作等。古城会议后，工农革命军终于在10月27日来到井冈山的茨坪，开始了井冈山斗争的峥嵘岁月。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最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呢？他在调查研究后认为：第一，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工农群众；第二，这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斗争经验丰富的地方武装；第三，井冈山上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周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工农革命军筹款筹粮；第四，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500里，纵横80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几条坎坷崎岖的小道通往山里，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最利于工农革命军的军事割据。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秋收起义部队从起义失败到上井冈山，历时一个多月，行程千余里，艰苦转战，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失望困惑情绪，终于将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给处于低潮中的中国革命带来曙光。这一过程，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勇往直前，敢于和善于在逆境中崛起的精神。

（二）面对共产国际的干预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所存在的教条化、模式化倾向，早就有所表现。1927年八七会议上，罗米那兹作为共产国际的新任驻华代表，错误地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打倒资产阶级。会后，罗米那兹系统地提出了“不间断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不停顿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应该时刻记住反对资产阶级。因而，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又为“左”倾错误开了绿灯。“不间断革命论”为中共领导人所接受并用以分析和指导革命，这样便形成了指导思想上的盲动主义。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在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提出了克服“左”倾盲动倾向的任务。这对于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对于正确认识形势，都有积极意义。但决议案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三个主要反革命势力”之一，提出“城市中心论”，并错误地指责农村游击战争，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产生了不良影响。

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这一理论的系统化、俄国革命经验的绝对化、联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右倾斗争，成为中共党内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直接来源和重要内容。1929年，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出三封指示信，认为革命高潮在延续，中国已进入全国危机时期，号召中共打击富农，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工农独裁”，并要求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克服党内“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发动群众“武装保卫苏联”。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进一步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于1930年6月1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制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由于这个计划过分冒险和违背“保卫苏联”的要求，不仅在党内遭到反对，也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开会，又派参加会议的周恩来、瞿秋白同志回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军事冒险行动。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认定立三路线为右倾，把“拥护国际路线的代表”王明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王明掌握领导权之后，推行了更“左”的路



线，理论更加系统，形态更加完备，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由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了严重损失。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于1933年被迫迁入红色区域，从而使他们的错误贯彻到红色区域的各项工作中，其恶果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放弃红色区域而作战略的大转移——长征。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存在的主要错误在于：

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脱离了中国国情。从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2月，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指导基本上是“左”的错误指导，直到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通过的《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才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和冷静的分析。

以苏联模式指导武装斗争的作战形式。由于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由于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共产国际总是以苏联革命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企图待革命高潮到达之日，来一个全国总暴动，以夺取全国政权。因而，在武装斗争的作战形式上，“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然失败的游击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些人，也把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及时将部队转移到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举措，污蔑为“逃跑主义”“游击主义”和“流寇主义”。这些人不明白只有采取灵活的积极退却、积极防御、积极反攻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才能逐渐壮大革命队伍，扩大红色区域，取得革命胜利。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湖南省委决定取消长沙暴动的计划。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也尔在长沙向中共中央报告，指责这是“临阵脱逃”，极力主张攻占长沙，反对部队到农村去积蓄革命力量。起义的少数领导人也持这种观点，而不愿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把“左”的对待富农政策强加于中国共产党。1928年年底，苏联共产党内围绕着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采取了“左”的政策。共产国际也把这一政策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在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中，批评了中共中央在1929年4月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认为党的依靠贫农而与中农联合的总路线被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路线代替了，中国共产党在富农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把富农作为民主革命打击的对象。这项“左”的政策，在井冈山斗争中虽然没有完全实行，但导致后来在中央苏区开展的所谓反“富农路线”的斗争。

极力推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1927年11月召开的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实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解除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撤销了他的湖南省委委员资格。消息传到井冈山，被误认为开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党籍。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来到井冈山，依据中央的指示，取消了井冈山前委，改组为师委，毛泽东同志为师长，不能过问地方党的工作，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正确领导地位，结果使边界“各县工作，顿失领导”，“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同时，由于根据地内的革命武装力量被调走，国民党反动军队乘虚而入，致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井冈山的“三月失败”，虽然直接原因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造成的恶果，但瞿秋白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上失误的一个表现。

面对共产国际的干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



际的直接干预下召开的，六大决议案是经过当时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亲自修改后形成的。六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进入新阶段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确定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引导作用。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在这个会上，同时打出了反右和反“左”的旗帜。令人痛心的是，这个会议其实是在向“左”转。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这样，所有非无产阶级和非农民的阶级、阶层都被推向了反革命的阵营，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同志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成了敌人，由此引发了一幕幕悲剧。

1929年1月，中共六大决议案经过辗转，在历经7个月的长途旅行后到达井冈山。而这时，井冈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决议案迟到了半年多，但毛泽东同志对此仍很重视，仔细地阅读了全文。决议案的一些内容让他想不通。待看到中央对于土匪的处置精神，他马上想到了袁文才和王佐，认为他们的问题需要区别对待。

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在根据地的高层领导中，统一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为了避免误会，会议避开了袁文才和王佐，只叫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参加。会议学习了党的六大精神，毛泽东同志宣读了《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即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以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过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决议案的这一精神，与会者议论纷纷。本来，有的与会者对作为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袁文才和王佐没有参加会议就有些犯嘀咕，现在听了这个决议案，才知道二人没有参加的原因。问题已经很明显了，袁文才和王佐正是中央所说的“这类首领”。

念完决议案，毛泽东同志未发表任何意见，燃起一支烟，眼光扫过会场。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不言而喻，矛头直指袁文才和王佐。最富戏剧性的是，王怀是1927年袁文才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时救出的被反动派关押的永新县党组织负责人。这时，听见龙、王二人这番言论，曾因上级一纸所谓“指示”而在湘南大吃苦头的朱德和陈毅等人立即反对：“看来具体问题还是要多具体分析。袁文才和王佐不能算是土匪的首领，他们在绿林时支援过革命，也曾被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现在二人又都是军委委员、特委委员，不但是党员，而且是党在根据地的领导人员，红军中出色的指挥员。难道我们忍心拿起屠刀，杀害我们自己的同志？”一语既出，陈正人、谭震林等人纷纷赞同。双方有些争执不下。

毛泽东同志将自己置于浓厚的烟雾包围之中，似乎对眼前的争论置若罔闻。最后，毛泽东同志将手中的烟蒂一扔，一锤定音：“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这样的同志如果被杀，我们将无立锥之地，革命事业将遭到重大损失。”

毛泽东同志对在共产国际操纵下脱离实际的“决议”的这种“叛逆”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敢作敢为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外部的干预，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真正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三次“左”倾错误的考验

八七会议后，先后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我们党面临着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考验。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抵制和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927年11月，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文件。当时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这次会议却认为革命处于高潮，因此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党员和群众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和农民暴动。会议认为要推翻地主阶级，就要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甚至认为小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革命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因此制定了没收民族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和中、小商人财产的错误政策。关于革命道路问题，会议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会议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这次会议使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因而在工作中造成许多损失。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肯定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大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大会着重批判了极“左”错误，指出盲动主义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只有消除极“左”的错误与情绪，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有成效。大会十分重视军事工作，决定培养军事工作人才，党、团员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周恩来同志在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批评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维护了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正确主张和功绩。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秋收暴动之后，农民军由湘而赣……夺城攻地，也是由游击队变成的。其他如赣西之袁文才部及黄安等的小游击队的发展，我们没有完满的计划。他还特别指出：毛朱的游击队，军阀对他们没有办法。同年11月28日，经周恩来同志修改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的报告》，在介绍中国共产党现状的同时，还如实报告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报告中指出：“湘、鄂、赣、粤的农暴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有几处（如赣西朱毛区域）斗争比以前更为深入”。报告在分析了江苏、广东、湖北、直隶、湖南等省的斗争情况后，又着重强调说：“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在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同志就由五大时的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了。尽管在中央政治局具有重要地位的张国焘当时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针，但很明显，这丝毫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抱有好感。从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红色政权和红军的力量有了蓬勃的发展，而且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恢复。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局对革命有利的变动，党内便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政治局内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者



对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高潮，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并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一整套冒险计划，将党、青年团、工会等机构合并，组成为各级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因而使一切日常工作均陷入停顿状态。这个决议在执行时，全国参加秘密革命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不过32 000多人；中心城市，如上海只有2 000千多人，武汉只有千把人，天津只有500人。因此，这个冒险的城市起义计划，在有的地方冒险推行，很快就宣告失败了，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立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当这个决议和命令下达后及其执行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和在白区的何孟雄为代表的党内部分同志曾经提出不同的意见，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拒绝了这一切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反而指斥这些正确的意见是右倾，打击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因而形成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打击政策。1930年6月，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休整，扩编为红军第一军团，辖四军、三军、十二军三个军。7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军团到皖南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扩大了红军。7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兴国召开了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万人誓师大会，号召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发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7月24日，红军胜利占领樟树。8月20日，红军避开南昌强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歼灭了文家市的敌军3个团又1个营。8月23日，毛泽东同志率前委机关赶到湖南浏阳永和市，红三军团也由长寿街赶到永和市，红一、三军团在永和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书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红三军团围攻长沙，久攻不下。毛泽东同志说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回到江西宜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到宜春，企图说服毛泽东同志攻打长沙，结果让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并反过来帮助毛泽东同志说服红三军团攻打吉安。随后，毛泽东同志率红军一举攻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这时赣南、闽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个县城，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给革命造成的更大损失，反而发展了革命力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命令湘鄂西红二军团和鄂豫皖红四军团会攻武汉的计划，命令闽浙赣红十军攻取九江的计划，命令广西右江红七军北上袭取柳州、会攻长沙的计划，均因敌我力量悬殊，未能实现。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后，右江根据地也丧失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要求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到9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议决案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改组了中央机关，基本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

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使王明等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王



明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的一个突出代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统治长达4年之久，极严重地危害了中国革命。

1931年2月，王明在党内公开散发了他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它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表现在政治、军事、组织等各个方面。

政治方面的主要错误是：第一，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打倒一切中间派，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第二，在关于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并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主张党在全国范围应采取“进攻路线”“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的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到来。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斗争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重大的决定作用和意义，要求农村根据地服从和配合城市工作，要求红军占领中心城市。

在军事方面的主要错误：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地打仗这一项，取消了群众工作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反对所谓“游击主义”，不适当地要求正规化。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以所谓正规战争反对人民战争及其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

在组织方面的主要错误：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把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提拔到中央或派到苏区以“加强领导”，贯彻其错误方针；一方面对不同意见其错误方针的同志，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搞无情打击。他们打击了瞿秋白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及一直在白区坚持斗争的一些同志。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仍顽固地推行错误的方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白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以至于临时中央在白区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1月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更直接地在革命根据地进一步贯彻。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与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委员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掌握了中央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对反对他们错误方针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了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中央红军长征突围时，博古、李德等人又表现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事前不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和转移的组织准备，却携带了大批辎重，行动缓慢，被动挨打，因此，长征的头3个月，虽然红军指战员英勇苦战，连续突破了敌人的4道封锁线，但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人员损失过半。接着，博古、李德等人又不顾蒋介石已调集重兵阻挡中央红军与湖南地区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新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的计划，使红军面临全军



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建议放弃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转军西征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广大干部和党员从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中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迫切要求改变中央的领导。同时，许多曾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从实际教训中醒悟过来，转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揭露与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同志等人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为成员的新的“三人团”。遵义会议精神在部队迅速传达后，全军振奋，好像拨开了迷雾，见到了阳光，疑虑和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不仅使党中央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还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等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一个政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犯了错误特别是犯了路线性错误之后，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勇气。这是实事求是的要求，也是开拓前进的基础。井冈山斗争时期乃至整个土地革命时期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培养了我们党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品格。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可是我们之所以有缺点而又能称为布尔什维克，其道理就在于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并有决心去改正自己的缺点。”

二、立足当下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深知，要在井冈山立足实际干革命，正确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建立战略基地是基础。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的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的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这体现了他重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一）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重要战略基地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武装斗争的舞台在农村。那么如何在广大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必须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谓革命根据地，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自己控制范围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政权，也称为红色政权，这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毛泽东同志指出：“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他同时认识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召开，但会议却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错误指导。会议决议案批评了我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1928年6月，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井冈山的朱毛红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进而“开始革命的进攻”。

毛泽东同志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对于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回复湖南省委的信中总结了六条理由说明红四军不应该开往湘南，中心思想是主张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指出，红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的重要经验总结。

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当时中国国情和看清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后提出的正确主张，他的认识显然与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者不一致。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中央和湖南省委采纳，结果造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内部还存在一种热衷于走州过府、大块吃肉，轻视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流寇主义”思潮，他们企图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这样就自然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对此，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明确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中国革命正是依靠这样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区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片片地发展壮大为全国基本区域，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

（二）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军事大本营

从1927年10月开始至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经过艰难建设，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根据地范围已拥有宁冈全县，永新、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一



小部。这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罗霄山脉中段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业已形成。

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表明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秋收起义失利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寻找到一条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同志率部上山以后，究竟在哪里安营扎寨，建立军事大本营，是经过一番周密思考。最后做出抉择的。据文献资料记载，毛泽东同志在引兵井冈、“茅坪安家”后不久，即1927年的12月份，就有“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的考虑。在《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指出：“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有一座大山，围绕这山的有永新、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五县。宁冈是中心，易守难攻。而各县民众运动，经了半年多的经营，也略有基础。同时向茶陵、永新进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以此地为大本营的意见，泽东同志早有了，便有边界特委组织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军事大本营也得到大家的认可，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给中央的报告说：“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向中央报告时指出：“……宁冈七县皆同属崇山峻岭，尤以井冈山为最险要，周围约有500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却可以休息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

总之，毛泽东同志选择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军事大本营，在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绝不是偶然的，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审慎选择的结果。他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很好的群众基础，很好的党组织，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和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他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因此，他断言，“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并精辟地指出：“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三）大力经营永新

龙源口战斗击破了赣敌第四次“进剿”，红军三占永新后，永新完全处于红色割据之下。永新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大县，它北通莲花、萍乡，西接茶陵，东邻吉安，南连宁冈，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境内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看，永新都显得极为重要。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军事大本营基础上，必须加紧在中心区域“建设坚实的基础”，为此，他提出要“大力经营永新”。

为了布置长期工作，夯实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进一步使“大力经营”永新方针落到实处，1928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县禾川中学主持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龙源口战斗的经验，研究了红军短期分兵，开展群众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与刚刚由湖南省委派到边界担任特委书记的杨克敏（杨开明）谈了“大力



经营永新”的想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因此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为此，采取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

一是分兵游击，发动群众。1928年6月27日部队即开始分兵。“派队四出游击进行筹款，组织党，组织苏维埃，分田，组织工农武装等工作。派出之部队各成立一行委指挥之，计派二十九团全部去莲花，28号占领莲花全县，同时又派队来吉安与安福的边界游击。”

二是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去了塘边，与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同住在一户贫农家。毛泽东同志以前来过这里调研，这一带人口稠密，方圆20里，居住了全县近2/5的人口，加之地形好，进退自如，如果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了，尔后向外发展，对永新全县割据局面的形成是很有利的。毛泽东同志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在群众中留下了许多佳话。韩伟曾回忆说，从七溪岭战斗至“八月失败”前，毛泽东同志在永新西乡夏幽、塘边一带住了一个多月。

三是抓党组织建设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塘边首先抓了党组织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塘边由1个支部发展到11个支部。

四是建立军事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永新的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分兵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建立各种党群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建立政权及地方武装赤卫队、暴动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二个军事根据地——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使之成为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的军事屏障。

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进入全盛时期，其主体横跨“六县一山”，即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湖南的酃县、茶陵，以及井冈山。面积7 200多平方千米，人口50万余。割据势力曾扩展到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万安、泰和、桂东、资兴等县边地皆属根据地的外围屏障。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根据地建设与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有机紧密地结合起来，并高度重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首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果实就保不住，土地革命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同样，没有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就不能存在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靠武装斗争来开辟、巩固和发展的，因此，要进行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就离不开武装斗争。其次，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红军就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都离不开土地革命。再次，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因而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同样，没有根据地的建立，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依托，就有可能变成流寇主义而被敌人击败。

三、思想建党纯队伍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



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这是他首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思想建党纯队伍，是在井冈山立足实际干革命的关键所在，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障。

（一）农民成分的党催生思想上建党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成成员必须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坚信：党必须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只有大量工人的加入，才能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如果大量的农民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那么，党就会变成“农民党”，从而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六大”前后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所谓的“农民党”十分警惕，“不要城市就是否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结果党只有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并且着重指出其危险性，“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有形成农民党的严重危机”。基于这种认识，那时特别强调在工人中发展党员。

但是，当时的中国和苏联及欧洲各国的情况有很大区别，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远不如苏联、欧洲的工人阶级队伍强大，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借助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力量。这样，就必须让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

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以后，首先恢复了各地党组织，然后，在边界党组织领导下，发展大批进步农民加入党组织。当然，党转入农村后，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涌入党内，也确实给党的建设造成很大困惑。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中曾指出，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很难。当时，党内外都有人否认党有“消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他们断言，中共完全退出了城市，长期存在于农村中，其成分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认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面对这种指责，毛泽东、朱德等同志认为，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不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而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它的纲领。

党在湘赣边界大批发展农民和知识分子入党，不但没有破坏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相反，党的建设因此而重获生机。事实证明，关于建党对象认识上的这种突破，是边界党和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一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贡献和发展。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把思想建党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从而保持了我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并为后来搞好党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员的成分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因为如此，当时党内存在“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无产阶级意识较为薄弱。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强调要在党内坚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针对边界地方党组织中存在的“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边界特委开展了许多思想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特委举办的党团训练班。党团训练



班的主要任务是“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党团训练班非常重视，经常亲自到训练班讲课。党团训练班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灌输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要团结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党内的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得到有效的克服。针对部队党员中存在的“雇用思想”，红四军军委在部队中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根本上提高思想觉悟，解决为谁打仗的问题，从而增强了党员的革命自觉性和责任感。

思想建党，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独辟蹊径地把党的建设引导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使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党的组织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壮大。

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以后，开始了中国特色建党理论的艰苦探索，并在实践中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根据地吧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创造性地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在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一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

（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党实践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联络边界各县农军，同时解决给养问题，1927年10月8日起，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游击。10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来到湖南酃县的水口村。水口村是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一个小山村，曾受大革命的影响，有过党的组织。得知工农革命军到了水口，中共酃县党组织当即派周里前来接头。毛泽东同志向周里详细了解了酃县党组织的情况，并对酃县党组织的工作进行指导。部队到达水口前夕，有一部分投机分子由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消极的道路。部队到达水口以后，仍然有人逃跑，其中还包括一些工农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如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团长苏先俊借向省委汇报为名离开了队伍。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确保“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贯彻，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亲自深入各个连队做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指示各连队挑选一批工农骨干分子，发展他们加入党的组织。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各连队党代表都做好了各自的工作。在部队到达水口的第二天，各连队党代表通知有关入党对象去团部开会。由于当时党组织在部队中还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这些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

1927年10月15日晚上，毛泽东同志在水口村叶家祠堂亲自主持了连队6名优秀战士的入党仪式。简陋的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除了几条长凳外，就是靠北墙的一张农家四方桌，桌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桌边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其中一张工工整整地写有入党



誓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另一张写有“C·C·P”三个字母。

仪式开始以后，6名新党员整齐地站立在方桌前，先由各个入党介绍人、各连党代表分别介绍发展对象的简历。接着，毛泽东同志依次同6个新党员谈了话，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党组织，入党以后有什么打算。当毛泽东同志走到新党员赖毅面前时，赖毅心中异常激动，又带着几分紧张。“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毛泽东同志亲切而又严肃地问。赖毅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来到一个造纸厂，做了造纸工人，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他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到修水找到了工农革命军，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深深懂得，要革命，要解放，就不能离开党。想到这里，他坚定地回答：“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更要坚决地革命！”毛泽东同志满意地点头说：“很好！很好！”随后，毛泽东同志又向大家解释了“C·C·P”三个字母的意思，说明这三个字母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并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最后，毛泽东同志庄严地举起右手，带领6名新党员宣誓。这次发展的6名新党员是：赖毅、陈士渠、李恒、欧阳健、鄢辉、刘炎。

宣誓后，毛泽东同志说：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做宣传，多做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要严守党的秘密……然后，他又召集各连党代表开会，在会上指出，以后要抓紧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各连都要像今天这样分批地举行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

水口建党，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建党活动，在我军党的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次建党活动，使军队党的建设由秘密转为公开。此后，各个连队都相继开展建党活动，人民军队中党的建设从此不断得到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加强连队党的建设，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军队党的建设最宝贵的经验。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中也有党的组织，但党组织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中领导者，北伐军并没有掌握在我党手中，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以后，十分重视连队党的建设，把支部建在连队，连队因此有了灵魂，有了核心，战斗力得到空前提升。“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队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的数量逐渐增多，这样真正形成了连队里的核心和堡垒，许多新党员从实际锻炼中成长了，成为连里的领导骨干。”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永新北田村有个名叫贺页朵的农民，他以榨油职业为掩护，积极为红军收集情报，运送食盐、粮食和弹药。他多次参加红军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积极救护伤员。1931年1月，中共永新县四区区委根据贺页朵的申请和表现，同意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25日，在榨油坊昏暗的油灯下，贺页朵参加了庄严的入党仪式，并在一块土布上写下坚定誓言：“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虽然简单24个字有9个错别字，但是，他对党的忠诚却没有打丝毫折扣，是那样的不容置疑，他对共产主义信念是那样的坚定。



第三节 继往开来闯新路

一、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首先表现在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上。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

2002年4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谭震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高度概括为“井冈山道路”。

中国革命是沿着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取得胜利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的结晶，是马恩列斯不曾讲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创举。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正确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执行这个原则的具体途径是不尽相同的。人们知道，由于受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在俄国的继承者，只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而没有能够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如何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经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夺取政权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但这个被恩格斯称为“国际的精神产儿”只存在72天便夭折了。另一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此产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不同于西方和苏俄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抄照搬外国经验，显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上海组织了三次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以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新军阀蒋介石窃取了革命果实。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建立了强大的反革命统治，倘若中国共产党再以仅有的一点弱小武装力量去同敌人拼“血本”，在中心城市搞武装起义之类的斗争，那就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由此看来，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确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只能在实践中靠自己的独创去解决，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和秋收暴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势下，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气概，独辟蹊径，引兵井冈，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的科学理论概括，就是后来毛泽东同志所表述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



取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新道路即井冈山道路的基本点，是毛泽东同志多次阐述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这三者是密切相连，互为依存，缺一不可的。

（一）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究竟以何种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由于外部没有民族压迫，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无产阶级政党可以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组织工会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开展合法的罢工斗争，而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因此，在那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合法的、不流血的、非战争的。

但是，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同时，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是武装到牙齿的。这是中国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看得很清楚，说得很透彻。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又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又反复阐述这一思想，“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且这种武装斗争必须是长期的，以军队为组织形式的。当然，中国革命以长期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并不是说可以放弃、忽视其他形式的斗争，只有其他形式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顺利开展，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革命问题。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对土地问题有着强烈的要求。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因此，在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才能与农民结成牢固的工农联盟，才能找到和依靠农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就不可能建立以农村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谙熟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开创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不久，就在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上，提出了“深入割据地



区的土地革命”的重要政策，并责成新成立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具体领导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是年5—7月，湘赣边界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建成红色区域的坚实基础。1928年12月，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宣告诞生。随后，经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三年多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和形成了一条比较完备、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土地革命路线，在中国革命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

中国革命在组织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也是由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革命的敌人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于敢于武装反抗的人民革命力量，是不惜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予以镇压的。共产党人为了在与敌人长期、残酷的斗争中能坚持下去而不为敌人所消灭，并避免在革命力量弱小时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较量，就必须有一个作为革命力量可以立足发展，革命军队可以安营扎寨、休养生息的地方，这就是农村革命根据地。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中国历史上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因此，“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这样一个“战略基地”，一个“伟大的革命阵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当时党和红军内部也存在一种热衷于走州过府、大块吃肉、轻视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流寇主义”思潮。毛泽东同志当即批评说：“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并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中国革命这条道路的伟大起点。

二、开创新的革命大本营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务实创新上。

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既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宏观思考、科学把握的结果，更是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时局和实际状况审时度势、果断决策



的结果。也就是说，井冈山道路是在实践斗争中“闯”出来的。

敢闯新路，首先必须选择和构建一个坚实的可靠的革命大本营。

革命大本营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堡垒，是红军和井冈山军民赖以存在的战略基地，也是井冈山精神孕育和形成的重要依托。

综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人们不难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大本营问题的抉择上，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贯穿了一种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同志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和开创，不是突发奇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的。这个深刻的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4个月内逐渐形成的“上山”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开始萌生，八七会议后得到深化，秋收起义失利后开始确立。

（一）毛泽东同志“上山”思想的提出和形成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6月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时，就号召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这是他最早提出“上山”的思想。7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陈独秀的“农军加入国民党军队”的错误主张，提出了对付敌人屠杀政策的两条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是毛泽东同志“上山”思想的进一步明确。7月20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农民部会议时又提出，如果“农民自卫军”不能公开存在，必须“上山”。毛泽东同志还以中央农民部长、农委书记的名义，主持制定了一个文件，即《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明确提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农军的出路和策略，就是“上山”。这是他“上山”思想在组织准备方面的体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上山”思想的深化。8月9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人提出农军应尾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他的“上山”思想更加坚定了。八七会议后，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毛泽东同志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对“上山”后的依靠力量已有所考虑。可见，从“马日事变”后到秋收起义失利，在毛泽东同志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上山”的蓝图。

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在浏阳文家市集结时，有的高级军官（如师长余洒度等）不同意毛泽东同志上山做“山大王”的主张，毛泽东同志解释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

从上述思想脉络，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的“上山”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的“上山”思想，是一个新理念、新概念。这个新理念、新概念，为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为中国革命的复兴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上山”概念的实质是什么？所谓“上山”，本质上就是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战



略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山区中去。

“上山”干什么？毛泽东同志反复思考和着意强调的是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注重军事，组织革命军队；二是结交绿林，造成大本营基础；三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构成毛泽东同志“上山”思想的主要内涵。

毛泽东同志“上山”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上山，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的有效途径；上山，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大举措；上山，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农村革命大本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

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早就有了“上山”的首创精神和大体构想，当湘赣边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时，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前委方能及时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转兵向农村山区进军，创立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

（二）“以宁冈为大本营”方针的确立

宁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大本营。毛泽东同志对宁冈的认识源于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当秋收起义受挫后，时任起义部队三团文书的宋任穷受命到南昌寻找江西省委，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通过宋任穷带给毛泽东同志一封密信，上书“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毛泽东同志据此重要信息，决定引兵井冈，向宁冈进发。从此，宁冈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横跨湘赣两省“六县一山”（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湖南的酃县、茶陵，以及井冈山），究竟以何处为军事大本营？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27年12月就有考虑，提出要“以宁冈为大本营”，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而且“累次呈明在案”。

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为什么要以宁冈为大本营呢？

毛泽东同志曾在茅坪写的一份报告中陈述道：“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较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当1928年6月底湖南省委派巡视员杜修经强令红四军向湘南出击时，毛泽东同志于7月4日致信湖南省委陈词说：“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事态的发展果然被毛泽东同志言中，后来，杜修经等乘毛泽东同志远在永新时，强行指令红军大队开往湘南，导致“八月失败”。随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可见，“以宁冈为中心”“以宁冈为大本营”的创见，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走遍”罗霄山脉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三）“围魏救赵”，向赣南广大地域拓展的重大决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惊恐。蒋介石撤换了朱培德，委任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统率湘赣两省军队6个旅共18个团，于1928年冬开始，向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会剿”。一时间，井冈山根据地四周，黑雾弥漫，杀气腾腾。

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同志，在宁冈商研破敌之策。这就是井冈山斗争后期著名的“柏路会议”。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宁冈县柏路村的前委、特委、红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首先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与力量对比，然后提出了迎战方略。他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于我不利，且敌人来势汹汹，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加上寒冬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援助，却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不能放弃。怎么办？要保住我们经营年余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计划，影响边界形势，转移敌人视线，以解井冈山之危。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最后决定：实行“围魏救赵”，主力出击赣南。

红军主力为什么要出击赣南呢？这是因为各方比较起来，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位于武汉、长沙和南昌之间，东有赣江和南浔铁路，西有湘江和粤汉铁路，北有长江犬险，南有株萍铁路，敌人运动方便，地区狭小，红军不宜前去。湘南敌人兵力强，易于聚集，群众斗争尚未恢复，因此也不宜前去；而赣南却比较适宜，一是山区路近；二是物资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三是距大城市较远，敌人聚集困难；四是赣敌战斗力较弱，外省军队地形人情不熟；五是赣东北有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吉安东固一带有江西红军二、四独立团，可以相互配合和策应；六是中央6月4日来信中亦有向赣南发展的指示。于是，会议在认真讨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去赣南最为适宜。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将中国革命的红色大舞台从井冈山搬到了大赣南。红军主力出击赣南，既可解井冈之危，又可开创新的革命大本营。当年“上山”是创新，现在“下山”也是创新。井冈山时期老红军宋任穷在《共和国之魂》中说得好，“实践证明，毛主席上井冈山是伟大的，后来决定分兵下井冈山也同样是伟大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亦认为，“下山的意义同上山的意义几乎是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当时如果不上山，革命就要遭到失败，甚至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必须找到一个落脚点，开辟一条新道路。但是你光上山在那个小的地块里头，革命发展就会受很大的局限。为了开展新局面，就必须下山，要攻打到发达地区去发展。最后，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上山、下山都有重要的意义”。红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率领下出击赣南，迎来了艰苦的鏖战。从瑞金大柏地到闽西长岭寨，一路气势如虹，所向披靡。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在国民党内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且认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一决策明确提出了在赣南、闽西20余县开创新



的革命大本营，从而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规划了蓝图，拉开了序幕。

中央苏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继井冈山之后又一新的革命大本营。

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创立上。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充满曲折和艰辛。毛泽东同志曾说：“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如此，也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井冈山精神是在实践中与“左”倾错误“斗”出来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当中国的农村游击战争刚刚发生时，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不要投入“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1929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打到赣南、闽西，共产国际仍然认为并且指令共产党“必须紧张全部力量去发动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政治罢工的方针”。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

然而，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却把共产国际的指示视为“金科玉律”，无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红军的存在及其发展前途。李立三在1930年3月份连续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论革命高潮》等文章，认为中国革命不需要艰苦的积蓄和准备，“将会在一瞬间，爆发出伟大的斗争”。

1930年4月3日，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致信朱毛红军前委，批评毛泽东同志等“红色割据”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保守观念”。指示信说：“‘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红色割据’，或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事，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是极端与党的任务相冲突的。”为了反对当时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抵制中央某些人的“左”倾指令，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深刻地阐述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表现出极大的首创精神与理论勇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阐明了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为此，毛泽东同志大声疾呼：“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他精辟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



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十分坚定地认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第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它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接着，毛泽东同志批评党内一些教条主义者说：“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萌生与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上已经开始成熟，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的首创精神。正是这种首创精神，使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复兴，由复兴走向胜利。

总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创建了湘赣边第一个工农兵红色政权等；在井冈山斗争后期，还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一个个“第一”，蕴含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创新气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伟大成功。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井冈山精神内涵的要义与核心。